“瞿秋白之死”真相

曹晋杰

“文化大革命”期间，时任江苏盐城专区中心卫生院内科主任的陈子刚（曾用名陈炎冰）被造反派关进牛棚批斗。因为陈子刚在国民党军第三十六师担任过上校军医，瞿秋白在福建长汀被俘，关押在第三十六师师部时，他奉宋希濂师长之命，为瞿秋白治病，两人差不多天天见面。造反派要陈子刚交代瞿秋白“叛背”经过，陈子刚坚决否认，他说：“蒋介石对瞿秋白冥顽不化十分恼怒，这才下令就地枪决，他怎么会是‘叛徒’呢？”造反派死盯住陈子刚不放，百般刑讯逼供，陈子刚始终不承认瞿秋白是“叛徒”。这里记述的就是陈子刚对瞿秋白的为人和殉难经过的回忆。

一、瞿秋白秘密赴沪治病途经福建长汀被俘

瞿秋白 1919 年参加“五四”爱国运动，192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出席中共“三大”、“四大”、“五大”、“六大”的代表，担任过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曾两度担任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1927 年 7 月～1928 年 7 月，1930 年 9 月～1931 年 1 月），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1927 年 8 月在武汉主持召开“八七”紧急会议，纠正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会后负责中央领导工作。1930 年 8 月，他与周恩来一起主持召开了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纠正向忠发、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在 1931 年召

开的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瞿秋白受到王明、博古等人的打击，被解除中央领导职务，去上海与鲁迅合作，从事左翼文化运动。1934年1月，组织上派瞿秋白往中央苏区，担任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人民教育委员。当年10月，红军主力开始长征，瞿秋白患有严重肺病，博古却将他留在中央苏区任中央分局宣传部长兼中央后方办事处人民教育委员，让他带病坚持敌后游击战争。

1935年初，中央分局决定撤销中央后方办事处。按照中央分局的疏散突围计划，邓子恢和其他一些同志返回闽西游击区，与先期返回那里的张鼎丞会合，领导闽西游击战争。同时，决定送身患肺病的瞿秋白和何叔衡等人，取道香港转往上海就医。邓子恢和瞿秋白、何叔衡以及项英的妻子张亮一行，在一队武装人员护送下，从瑞金九堡附近启程。他们到达瑞金县武阳区政府以后，又会合了正在那里等候他们一起行动的原中央妇女部长周月林（中央政府办事处副主任梁柏台之妻），然后继续前进，来到长汀县四都汤屋中共福建省委所在地。省委为了保卫他们的安全，派出200余人的武装护送队，省委书记万永诚还派妻子参加护送队，照顾和保护周月林等女同志，他们于2月21日离开四都向永定、上杭一带游击区突围。

从长汀到永定大约有四五百里，一路山高路险，沟壑纵横。国民党在这一地区派出了大批正规部队和保安团，日夜搜山“清剿”，筑起千百个密布的碉堡，构成一道道严密的封锁线。邓子恢、瞿秋白、何叔衡一行为了安全，化装成香菇客商和随行眷属。为了避开敌人的追袭，他们昼伏夜行，小心翼翼地在敌人的封锁线上穿行。2月26日凌晨，他们到达长汀县濯田区露潭附近，前面一片宽阔的江水挡住了去路。这就是闽西第一大河汀江。这时，东方已经泛白，

他们必须立刻渡过江去。好在这季节是枯水期，江水并不太深。邓子恢指挥护卫队员们搀扶着年老体弱的同志，安全地涉水渡过了汀江，迅速向山区转移，黎明时分到达坐落在崇山深处的小迳村。

经过一夜的艰苦行军，大家早已疲惫不堪，饥肠辘辘，决定在此稍作停顿，等到下午再继续前进。不幸的是，他们的行踪被当地的地主武装“义勇队”发现。这一带是福建地方反动武装保安第十四团钟绍葵部的“清剿”区，归属驻长汀的国民党军第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统辖。该团第二大队就驻扎在小迳村附近的水口镇，而钟绍葵亲自率领5个中队到这一带“剿匪”，也正宿营于此。钟绍葵获悉这一情报，立刻下令对这支红军小分队进行包围袭击。钟绍葵在后来给国民党军驻龙岩绥靖区司令官李默庵的报告中，作了这样的叙述：“2月24日，职率5个中队搜剿汀江两岸散匪，25日宿营水口，26日下午，据当地民众报告，水口以下五里许之露潭有匪百余渡河，职即令第二大队长李玉率特务三中队前往围剿。迨我军追到，该匪已渡过露潭到以东约五里之高山，据险顽抗。我军分三面攻击，约半小时，匪不支即满山逃窜。”

邓子恢等人事先并没有估计到这一带的敌情是如此严重，但是也有所防备，在村头布下岗哨以后，就在村里生火造饭。他们刚刚端起饭碗，村头传来了哨兵与敌人接火的枪声。他们掷下饭碗，到村头一看，只见数百名敌人沿着山道向村里扑来。负责护送的保卫队丁队长是个虚浮胆怯的无能之辈，看到敌人蜂拥而来，吓得不知所措，撇下了这批中央高级干部和护送部队，独自逃命去了。邓子恢当机立断，立刻组织护送部队向村子对面的一座高山牛子仁岽转移，希望在那里打开一个缺口冲出去。当他们冲到山上时，敌

人另一支部队已经从侧翼包抄过来，堵住了他们的去路。护送部队陷入了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情况万分危急。何叔衡见激战多时，难以突围，感到自己年迈体弱，不愿拖累大家。他对邓子恢说："子恢，我不能走了，我为苏维埃流最后一滴血。"说着就要夺警卫员手里的枪。邓子恢急忙说："你千万不能这样！"此刻，何叔衡已是站在一处陡峭的山崖边上，就势向山下跳去。在山崖下，身负重伤的何叔衡，被两个匪兵凶残地开枪杀害。

在这紧急关头，邓子恢继续指挥队伍向山下转移。他和病重的瞿秋白以及剩下的同志，从一片树木茂密的山坡滚落下去。经过激烈的战斗和奔走，瞿秋白自感体力不支，难以坚持突围，他不愿拖累大家，坚持不走，与周月林、张亮隐蔽到一处灌木丛中，准备等待机会再突围出去。战斗结束之后，敌人在搜索时发现并逮捕了他们。

二、国民党多次派人劝降瞿秋白均遭拒绝

瞿秋白被捕当晚，保安第二大队长李玉对他行刑审问。瞿秋白忍受刑痛，巧妙应答，不露真情。第二天，他们被押往上杭监禁。在上杭又遭受保安第十四团团长钟绍葵严刑逼供，瞿秋白咬紧牙关忍受皮肉之苦，仍然按原来所供，称自己叫林琪祥，江苏人，现年 36 岁，肄业于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后在上海经营旧书店及古董生意，又入医科学校学医半年。1932 年因病赴福建漳州就医，适红军打进漳州，将其俘虏送往瑞金，先后在红军卫生部当过医生、医助、文书及文化教员。红军长征后，被留在福建省苏维埃、省军区医务所做医助。1935 年 1 月携款潜逃，但在路上被苏区地方武装发现，当夜由保卫局人员看押，准备天明再走，不意被国民党军队发现俘虏。

钟绍葵对瞿秋白的供词，听不出有什么破绽，也就停审收监。

不料时隔不久，情况突然发生变化，由于和瞿秋白同时被捕的万永诚之妻，受不了惨无人道的酷刑逼供，她说出了在长汀濯田地区被俘人员中有瞿秋白。此消息上报后，国民党军第三十六师电令钟绍葵将瞿秋白于5月9日押送长汀，关在设于长汀中学校里的第三十六师师部。此时，正在上海治病的第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接到蒋介石的命令，要他立即赶到长汀，对瞿秋白进行劝降。宋希濂把师参谋长向贤矩和师部几位处长叫来一起商量，一致认为："以柔克刚是一条古训。对瞿秋白这样声望大、职位高的人，不能一般对待，要以情感人，软化他，才能谈及其他。"随即研究了对待瞿秋白的几条措施：（一）另辟房间，供给古书、诗词集和笔、墨、纸张。（二）新购白裤褂两套，布鞋两双。（三）按三十六师官长饭菜标准供膳，烟酒另备。（四）每天允许在院内散步数次，指定副官和军医照料，房间门口白天撤掉看守。（五）自宋希濂师长以下，一律对瞿秋白称先生。（六）禁止使用镣铐和刑罚。从这时起，陈子刚几乎每天都为瞿秋白检查身体，照顾他服药。

在这期间，宋希濂和瞿秋白进行多次谈话。第一次谈话时，宋希濂一见面就称瞿秋白先生，而瞿秋白讥讽地回答："我现在不是你的先生，而是你的阶下囚。"在这尴尬的情况下，宋希濂扭转话题说："我也到上海治病，刚刚回长汀。这次回来，从龙岩到长汀这一段数百里间，人烟稀少，田地荒芜，有不少房舍被毁坏了，我想以前不会是这样荒凉的，这是你们共产党人搞阶级斗争的结果。"接着又说："有500亩地以上的地主，在每个县里都是为数甚微，有几十亩地的小地主，大多数是祖辈几代辛勤劳动积累几个钱，才逐步购置一些田，对这样的小地主进行斗争，弄得他们家破人亡，未免太

残酷了。因此，我觉得孙中山先生说中国社会人有大贫、小贫之分，阶级斗争不适合于我国国情，是很有道理的。”瞿秋白听后，非常严肃地说：“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了几千年来的封建统治，这是对于国家的伟大贡献。但孙中山先生所搞的三民主义，把中外学说都吸收了些，实际上是一个杂货摊，是一种不彻底的革命。中国的土地大部分都集中在地主富农手里，只是地区之间程度的差别而已，我们共产党人革命的目的是要消灭剥削，不管是大地主还是小地主，不管是大资本家还是小资本家，他们都是属于剥削阶级，即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有地主，就有被剥削的农民，有资本家，就有被剥削的工人，怎能说阶级斗争不适合我国国情，显然这种说法是错误的。”这次谈话，让宋希濂无言可对，只得草草收场。

宋希濂为了完成蒋介石的旨意，仍不死心地第二次与瞿秋白谈话。一见面，宋希濂说：“瞿先生，听说你太悲观了。我是很敬重你的，在湖上中学时，我就拜读过你的文章，那时慕名而不得见。今天在这种场合相见，对我是一段意想不到的插曲。我虽有军务在身，仍有一种抑制不住的感慨。”瞿秋白打断了宋希濂的话说：“宋先生，你不必往下说了。我不想判断你讲的这些话的用意。我可以坦率地说，第一，任何说辞改变不了我们今天相对立的位置；第二，我的命运并非你宋先生能主宰的。”这时，宋希濂强硬地说：“我想着重提醒你，别忘了眼下自己的处境。时至今日，你还没有对我们讲一句有关共产党和匪区有价值的情况，这对你是很不利的！”瞿秋白冷笑地说：“说得好，这几句话才是你绕着大弯子找我谈话的本意，也是多日来一直想完成蒋介石交给你的任务而使的小小手段！我可以告诉宋先生，几年来我身患重病，在苏区所做工作甚少，管

过一些扫盲识字办学校的事，你不愿意听这些吧！至于其他情况，我早就说过，无可奉告。好了，纸该戳穿，我们的谈话应该结束了。”

宋希濂以后的几次谈话，在瞿秋白身上仍然没有捞到半根稻草。中统特务头子陈立夫，就从南京派出办案很有经验的中统局训练科长王杰夫、行动科干事陈建中，会同国民党福建省党部秘书钱永健、厦门市党部书记长朱培璜等到长汀，对瞿秋白进行劝降。谈话进行了数次，瞿秋白慷慨陈辞，使敌人哀叹和失望。

王杰夫提出，希望瞿秋白协助翻译托洛茨基的著作，瞿秋白说：“我对俄文固然懂得一些，译一点高尔基等文学作品，自己还可胜任。如果译托洛茨基反对联共的著作，就狗屁不通！”

钱永健以顾顺章为例劝降，瞿秋白斩钉截铁地回答：“我不是顾顺章，我是瞿秋白。你认为他这样做是识时务，我情愿做一个不识时务笨拙的人，不愿做个出卖灵魂的识时务者！”

朱培璜用亲友关系来拉拢，瞿秋白的回答是：“我自己的问题，从来由自己，不劳朋友亲戚甚至家属来考虑。特别是政治问题，过去是我自己考虑，现在不可能也无必要亲友代劳。”

为了摆脱这些人的纠缠，瞿秋白后来干脆说：“王先生、钱先生，谢谢你们的好意。劳了你们远道而来，几天来费尽心机和口舌。我的态度，都谈得一清二楚，任何改变都是不可能的。事实上没有附有条件是不会允许我生存下去的，这条件就是要我丧失人性而生存。我相信凡是真正关心我、爱护我的亲友家属，特别是吾妻杨之华，也不会同意这样毁灭的生存，这样的生存只会长期给他们带来耻辱和痛苦。”

王杰夫等人要回南京复命时，第三十六师为其设宴饯行，席间

王杰夫说:“我们不能做到瞿秋白为我们所用，这就说明我们工作的失败。”宋希濂师长也说:“要瞿秋白为我们国民党所用,实在等于做梦。他关押在狱中还不放弃宣传马克思主义,我们师部有些人对他看法就不正确。他多在师部一天,我就不放心一天。”国民党当局想通过劝降瞿秋白,查明共产党在上海、香港地下组织关系和在江西苏区的潜伏地下活动计划及从上海到中央苏区地下交通线的情况,也就彻底落空了。

三、瞿秋白身在狱中始终为中国革命的前途担忧

瞿秋白在上杭、汀州狱中,写了一篇近两万字的《多余的话》,这是瞿秋白在王明“左”倾路线统治之下,中央苏区已丢失,游击战争又暂时遭受失利,自己身在国民党狱中,生命只能用星期和日来计算的时候,挥笔写给同志们的“担忧书”,担忧中国革命前途。

瞿秋白从党的“六大”直到六届四中全会前夕,对王明推行的所谓“国际路线”了解深切,始终和王明宗派集团进行着尖锐斗争。但是,王明在米夫为代表的共产国际的支持下,主持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指责瞿秋白犯了“调和路线”的错误,对他进行“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解除了他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会后有人问瞿秋白:“为什么你对那些无中生有的诬蔑不置一词，不为自己辩解呢?”他回答说:“我个人的问题算不得什么,这些都是枝节问题。我倒是担心革命的前途啊！”

瞿秋白受打击后,在上海和中央苏区从事文化教育工作。他目睹王明“左”倾路线统治中央给党造成的严重危害,尤其是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给中国革命几乎造成灭顶之灾。8万多人的主力红军转移到哪里了?红军游击队还有多少?思想路线斗

争、革命前途事关重大，今后认识能否统一？革命队伍如何壮大？这些使身处国民党狱中的瞿秋白忧心忡忡。这种忧心既不能不讲又不能直讲，所以在《多余的话》的开头，就启示同志们注意自己“心忧”之所在。

瞿秋白最担忧的是王明“左”倾路线在党内还要统治多久？希望早点结束。他用“我的确没有认出，立三路线和国际路线的根本不同”这句话来暗示人们，王明路线实质上和立三路线一样犯着性质相同的错误。

王明上台后的所作所为，瞿秋白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的。他想争辩，又感到争辩起来太麻烦。他在《多余的话》中写道：“当时，我逐渐觉得许多问题不但想不通，甚至想不动了。”这时，瞿秋白只是一名普通党员，在党内毫无发言权了。因此，他写道：“偶然我也有对中央政策怀疑的时候，但是立刻停止怀疑了，因为怀疑也是一种思索，我既然不思索了，自然也就不怀疑。”实际上是在怀疑，在谴责王明路线给中国革命造成的重大损失，在启迪党内的同志们，要高举马列主义旗帜，彻底批判和纠正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使中国革命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

瞿秋白写《多余的话》期间，陈子刚去为瞿秋白检查身体治病，瞿秋白说：“目前我这种处境，用点药也只是减轻病痛，认真治疗已经完全没有必要了。”“我对自己目前的处境十分清楚，蒋介石决不会放过我的，从被认定身份之后就没有打算活下去，我唯一的希望，是让我把要写的东西写完，我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瞿秋白写完《多余的话》，如释负重，心情放松了许多。《多余的话》一文中多处写道：“永别了，亲爱的朋友们！”“永别了，亲爱的同

志！”“我去休息了，永久去休息了！”“永别了，美丽的世界！”“告别了，这世界的一切。”这表明瞿秋白早已有为革命而献身的思想准备。在1934年10月，告别长征西去的战友时，瞿秋白曾慷慨激昂地说：“我个人的命运，以后不知怎样，但是可以向战友们保证，我一定要为革命奋斗到底，始终不渝。”

有人说，瞿秋白《多余的话》是向国民党坦白的“投降书”，这完全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多余的话》一方面热情洋溢地颂扬了中央苏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成就；另一方面驳斥了国民党对苏区的攻击和诬蔑。字里行间没有讨好和吹捧国民党、蒋介石，没有诋毁和攻击马克思主义、共产党，没有出卖组织和同志，没有向国民党暴露共产党的机密，怎能说是“投降书”呢？倒是国民党反共文人赵庸夫说了真话，他著文评论这篇《多余的话》时说：“首段叙在沪之生活状况，中段述刚到匪区之感想，末为匪区政治的设施，及其对伪政府之鼓吹，因而不便发表。”

四、瞿秋白面对死亡从容高唱《国际歌》

瞿秋白在狱中，除了看书，便和陈子刚闲聊，两人成了特殊的朋友。瞿秋白把自己在狱中写的三首诗词，重新抄录了一遍，送给陈子刚留念。

廿载沉浮万事空，年华似水水流东，枉抛心力作英雄。
湖海棲迟芳草梦，江城辜负落花风，黄昏已近夕阳红。

——浣溪纱

寂寞此人间，且喜身无主。眼底云烟过尽时，正我逍遥处。
花落知春残，一任风和雨，信是明年春再来，应有香如故。

——卜算子

山城细雨作春寒，料峭孤衾旧梦残。

何事万缘俱寂后，偏留绮思绕云山。

——七绝·梦回

诗词后边，瞿秋白写道：

一九三五年初夏，草于汀州狱中，录呈炎冰先生雅正

瞿秋白

署名下边还盖了硃文石印“息为”二字，意思是“息即无欲而归天为”。

同时，瞿秋白还将自己的一张全身照片，送给陈子刚。他在照片背面写道：

炎冰先生惠存

如果人有灵魂的话，何必要这个躯壳！但是，如果没有的话，这个躯壳又有什么用处？’这并不是格言，也不是哲理，而是另外有些意思的话。

秋白

1935 年 6 月 2 日，蒋介石给蒋鼎文发了一道密令：“瞿秋白即在闽就地枪决，照相呈验。”由于陈立夫派要员到长汀狱中对瞿秋白进行劝降，而拖延了执行的时间。在蒋鼎文的催促下，第三十六师决定于 6 月 18 日上午对瞿秋白执行枪决。但是，宋希濂还抱着劝降的一线希望，于 17 日晚，特派师参谋长向贤矩提前告诉瞿秋白。向贤矩备了 2 碟荤菜，1 瓶白干酒，来到瞿秋白“囚室”，皮笑肉不笑地说：“瞿先生，你在这儿有一个多月了吧！今晚，我们再对饮几杯。”瞿秋白坐在小方桌边问：“我不记日子了，怎么，要送我上路？”向贤矩却严肃地说：“是的，你多次讲过，从被俘后就没有打算

活下去。现在，最高当局来电报，命令在闽就地枪决，可以成全你了。师部遵照委员长命令，决定明天上午执行。让我提前转达你，你还有什么话要说，要办什么事，可以直说，我们将视情况而为之。”瞿秋白听后无所畏惧地说：“我早就等着这一天，这样做了才符合蒋介石其人的作为。我提议，为你们提前给我送行干杯！”他们的最后一次谈话，让宋希濂彻底绝望了。

6月18日清晨，瞿秋白起床后，换上了洗净的对襟黑褂、白裤、黑袜、黑布鞋。梳洗毕，坐在方桌前，点支烟，喝杯茶，翻阅唐诗，吟读着，思索着，并挥笔写下“夕阳明灭乱山中，落叶寒泉听不穷，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万缘空。”的绝命诗。正8点时，第三十六师的特务连长廖祥光闯进房内，笑着说：“恭祝瞿先生，今天是个好日子”，并出示了蒋介石“就地枪决”的电令。瞿秋白仍非常镇定地把诗写完，并附跋语，末署“秋白绝笔”字样。随即跟廖祥光来到长汀中山公园拍照。瞿秋白“信步行至凉亭前，已见小菜四碟，美酒一瓮，独坐其上，自斟自饮，谈笑自若，神色无异。酒半乃言曰：人之公余，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

上午10时许，瞿秋白缓步走出中山公园，手持香烟，神色不变，沿途用俄语唱《国际歌》，还唱《红军歌》。到罗汉岭草坪刑场后盘足而坐，还回头微笑对刽子手说：“此地很好”，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万岁！”等口号，饮弹洒血，从容就义，年仅36岁。

新中国成立后，为纪念瞿秋白就义15周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瞿秋白文集”四卷，毛泽东主席特地为文集题词：

瞿秋白同志死去十五年了。在他生前，许多人不了解他，公开反对他，但他为人民工作的勇气并没有挫下来。他在革命困难的岁

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宁死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会永远活着，不会死去的。瞿秋白同志常用脑子想问题的，他是有思想的。他的遗集的出版，将有益于青年们，有益于人民的事业，特别是在文化事业方面。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在瞿秋白就义20周年时，党中央决定将瞿秋白遗骨从福建长汀迁葬北京八宝山，位于任弼时墓以东。在瞿秋白就义45周年时，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瞿秋白选集》14卷。在瞿秋白就义50周年时，党中央召开纪念会，杨尚昆代表党中央讲话，高度评价瞿秋白革命的一生，扫除了横加于他生前身后的一切诬陷的灰尘，还原他作为“中共早期著名领导人”的光辉形象。

（本稿由盐城市社科联推荐）

曹晋杰，作家、副编审。祖籍江苏盐城，1935年10月出生于无锡。曾任市文联专职副主席，市政协常委、文史委副主任。兼任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新四军研究会常务理事、革命纪念馆专业委员会会长等职。多次出席国际性和全国性学术讨论会。

主要专著有：新四军史研究方面的《新四军重建军部以后》、《华中抗日根据地文化建设史》、《红旗十月满天飞——新四军领导人在盐阜区的故事》等；古典文学研究方面的《施耐庵新证》、《罗贯中传奇》、《李汝珍传说》等；人物传记方面的《中国二乔·胡乔木、乔冠华传略》、《抗战时期在中国的外国国家元首》、《周恩来与新中国文艺事业》等；地方史研究方面的《盐城史话》、《盐城文化旅游丛书》等；长篇小说方面的《金屋新梦》、《梦龙遗恨》、《水浒变形传》等；此外，还有《曹晋杰文集》上、中、下三卷。